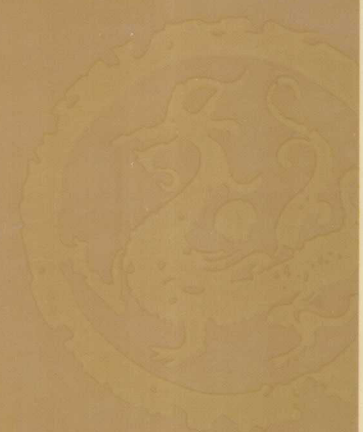




新中国

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

张剑平等 著

XINZHONGGUO ■ ■ ■ ■

LISHIXUE FAZHAN LUJING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新中国

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

张剑平等 著

XINZHONGGUO ■ ■ ■ ■ ■

LISHIXUE FAZHAN LUTING YANJIU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张剑平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
ISBN 978-7-01-010818-6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580 号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

XINZHONGGUO LISHIXUE FAZHAN LUJING YANJIU

张剑平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9.5

字数:688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818-6 定价:9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历史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1946年9月至1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任系主任。1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1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壁、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河北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2005年以来，又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建成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获得空前大的支持力度，迎来更新更好的发展机遇。在继续编印《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和《宋史研究丛书》的同时，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成员除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外，主要有：郭东旭、刘敬忠、郑志廷、汪圣铎、张家唐、闫孟祥、刘秋根、刘金柱、吕变庭、杨学新、雷戈、肖爱民、肖红松等先生。

研究历史，教书育人，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天职。

不吝赐教，日新月异，臻于完善，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对本学科的长期厚爱和支持。特别鸣谢人民出版社对《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的鼎力襄助。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姜锡东 成员：王菱菱、范铁权、丁建军

序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在该著作正式出版之前，本人参与了该项目的鉴定，有幸先睹为快，在有诸多收获的同时，也自然有不少感触。

有这样一种说法：新中国的史学，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限，在此之前的史学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说教”，因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史学；而在此之后才有史学，其重要标志是开始用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改造中国史学。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与事实不符。那么，事实是什么呢，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事实呢？本书的编写者们则在严格考实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靠学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使然，无疑这是一件十分艰难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同时无可讳言的是，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如是。因此，作者强调：“不能简单地把‘十七年’的史学称之为‘教条史学’”，应充分肯定“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学研究及学科建设”，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极左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如反右扩大化等对中国史学的消极影响。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场浩劫，“影射史学”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遭受残酷迫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揭开了崭新一页，历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作者对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迅速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其重大理论成就、学科建设、史学理论与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等，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

只有科学分析新中国历史学发展以往的路径，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研究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发掘、整理和研究翔实的相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容，以推动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非为历史而历史。进行这项工作，并非只有本书这一家，但本书却表现出突出的特点，即研究新中国的史学时，没有割裂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联系，没有割裂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新中国历史学的特点，是时代的产物，其形成是不能脱离历史的，既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经济发

展的历史，也不能脱离史学自身发展的学术的历史。就事论事，仅仅在“中国史学”的范畴内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很难做到的。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是深入开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或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或旧论重提，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化，使其研究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或自觉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科学的阐释。所有这些，在本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特别是新时期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有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如“对西方史学的特殊关注”、“西方新史学模式与新时期中国史学”、“向跨学科研究迈进”、“‘全球史观’与新的世界史体系”、“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及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等。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我以为“世界眼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总是要在这方面表现出来。本著作的编写者具有这方面的意识，并进行了积极的努力，确实让人感到欣慰。

本书主编张剑平教授 1964 年生于陕西咸阳，是中国史学年轻一代的优秀学子。他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攻读博士时，我与他有些交往，虽然联系不多，但他刻苦自励，持之以恒，对学术的追求、执著与好学深思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愿《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的问世，成为剑平教授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今后会有更多更优秀的成果问世。

于沛

2012 年 5 月 7 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新思潮影响之下的中国近代新史学	(1)
一、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传入及其影响	(2)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9)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初步开展	(15)
四、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26)
五、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31)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成就	(38)
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	(38)
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起步	(42)
三、世界历史著述的译介和中国的世界史著作	(44)
第三节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概论	(48)
一、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道路和成就概说	(48)
二、新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55)
三、“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的意义及基本研究思路	(62)
四、本书的基本架构和主要学术观点	(64)
第一章 史学家跟随新时代步伐不断进步	(67)
第一节 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	(67)
一、生动活泼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67)
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全面开展	(70)
三、实证派史学家的思想改造	(73)
第二节 对胡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批判	(77)
一、胡适历史观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77)
二、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	(80)
第三节 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评价	(83)
一、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的局限性	(83)

二、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评价	(86)
第二章 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原则和组织机构	(8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88)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指导	(88)
二、唯物史观理论与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92)
三、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促进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96)
第二节 新中国对苏联史学的学习与借鉴	(102)
一、中国史学界学习苏联热潮的形成	(102)
二、新中国成立初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105)
三、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108)
四、中国史学界对苏联史学态度的逐步转变	(112)
第三节 新中国的史学家队伍和组织机构	(114)
一、新中国主要的史学机构和人才培养机制	(114)
二、中国史学会与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129)
第三章 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学研究及学科建设	(134)
第一节 对中国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	(134)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初步探讨	(134)
二、围绕中国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的争鸣	(140)
三、对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和理论探讨	(143)
第二节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艰难起步	(150)
一、史料学的发展及对考据方法的新认识	(151)
二、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初步开展	(156)
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发展	(162)
第三节 苏联史学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影响	(169)
一、苏联史学在世界史方面的成就	(169)
二、苏联史学在建立世界通史新体系方面的成就	(173)
三、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175)
四、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史学	(183)
第四节 考古学和民族学对历史研究的推动	(192)
一、新的考古发现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192)
二、民族调查及其推动下的民族史研究	(199)

第五节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和研究路径的转型	(211)
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成就	(212)
二、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的转型	(216)
第四章 社会政治运动影响下的史学批判	(221)
第一节 反右扩大化和“史学革命”的影响	(221)
一、史学界反右扩大化及其影响	(221)
二、“大跃进”中的“史学革命”及其危害	(229)
第二节 史学界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	(236)
第三节 “史学批判”之风的再起	(240)
一、对“历史主义”观点的批判	(241)
二、对旧著《中国通史》的批判	(243)
三、《李秀成自述》讨论向政治批判的转向	(245)
四、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批判	(247)
五、围绕《海瑞罢官》展开的激烈争论	(253)
第五章 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问题	(258)
第一节 应正确认识和评价以往史家所关注的问题	(258)
一、若干重大问题争鸣讨论的意义	(258)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	(261)
第二节 “十七年”史学并非完全教条化	(265)
一、“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	(265)
二、杰出史学家为克服教条主义的不懈努力	(269)
第三节 “十七年”史学并非仅仅是一部“中国农民战争史”	(271)
一、“十七年”史学的多方面成就	(272)
二、“十七年”史学并非片面的反封建史学	(274)
第四节 “十七年”历史学发展的教训	(275)
第六章 新中国历史学遭受的挫折与获得的新生	(279)
第一节 “文革”时期历史学遭受的挫折	(279)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遭受迫害	(279)
二、“文革”中后期的“影射史学”	(286)

三、“文革”中后期学术研究工作的初步恢复	(294)
第二节 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	(303)
一、对“影射史学”的批判	(303)
二、给遭受迫害的史学家以公正的评价	(307)
第三节 历史学教学科研秩序的恢复和发展规划的制定	(313)
第七章 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与新认识的提出	(323)
第一节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	(323)
第二节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新探讨	(335)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讨论	(335)
二、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讨论	(340)
第三节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	(350)
一、关于中国奴隶制问题的新认识	(350)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证研究	(354)
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再探讨	(358)
第四节 中国近代史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	(364)
一、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的讨论	(364)
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探讨	(368)
第八章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376)
第一节 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376)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理论关系的新认识	(376)
二、关于“史学理论”的概念及体系的探讨	(379)
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成就	(382)
四、“史学理论”研究及学科的新发展	(388)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391)
一、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的奠定	(392)
二、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新发展	(396)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399)
一、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学科基础的初步奠定	(399)
二、新中国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406)
第四节 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成就及其学科建设	(411)
一、西方史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412)
二、新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发展	(418)

第九章 考古学与人类学对历史学发展的推动	(424)
第一节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	(425)
一、1976 年之前的考古发现和文明起源的探索	(425)
二、1977—1985 年的初步探索	(426)
三、1986—2000 年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现状	(431)
四、新世纪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趋势	(438)
第二节 秦汉简帛对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444)
一、简帛与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	(446)
二、秦汉简帛对经济史研究的促进	(453)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推动	(457)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457)
二、敦煌吐鲁番文书促进了均田制度的研究	(460)
三、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赋役制度的研究	(464)
第四节 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467)
一、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	(467)
二、重大理论问题认识的突破	(471)
三、关于汉族乡村与社区的研究	(477)
四、人类学对历史学发展的促进	(479)
第十章 新时期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	(487)
第一节 新时期经济史再度繁荣道路的探索	(487)
一、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再度繁荣	(487)
二、经济史学家及其团队的研究风格与范式	(490)
三、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497)
第二节 新时期社会史的复兴道路	(502)
一、社会史的复兴道路	(503)
二、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510)
三、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515)
第三节 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反思	(520)
一、对经济史研究路径的反思	(520)
二、对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反思	(523)
三、关于经济史与社会史关系的探讨	(526)

第十一章 新时期西方史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531)
第一节 对西方史学的特殊关注	(531)
一、重新认识西方史学	(532)
二、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	(536)
第二节 西方新史学模式与新时期中国史学	(539)
一、法国年鉴派的史学范式及其在中国的反响	(539)
二、西方社会史理论和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543)
第三节 向跨学科研究迈进	(548)
一、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方法论	(549)
二、心理史与社会史的兴盛	(550)
三、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552)
四、环境史的兴起	(553)
第四节 “全球史观”与新的世界史体系	(559)
一、“全球史”的产生	(559)
二、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563)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及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567)
一、后现代主义史学在西方的兴起	(568)
二、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571)
第十二章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的探讨	(576)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的探讨	(576)
一、“史学危机”话题讨论中历史学发展路径的探索	(576)
二、商品经济大潮下中国历史学如何发展问题的探讨	(58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论说	(590)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590)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魅力	(592)
三、正确处理历史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	(594)
第三节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597)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新挑战	(598)
二、新世纪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探讨	(603)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推进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607)
附录:“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613)
后 记	(617)

绪 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传入，进一步促进了鸦片战争以来正在逐步变革中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学的产生。在中国近代“新史学”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西方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传入，催生了中国相应学科的产生，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初，党和政府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受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文化大革命”使得正在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遭受了重大打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历史学的发展进行系统深入地总结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新思潮影响之下的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史学丰富的遗产，奠定了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广阔的学术基础。西方近代史学观念影响之下的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初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西方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传入，都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历史学，虽然与 1949 年以前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区别，新中国的历史学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曾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予简单的否定和批判，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并不是绝对无缘和对立的，新时期史学界高度重视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重视对这一时期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吸收，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学术成就对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关于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学术基础，正如学者所言：“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第一，自 20 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

步伐。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其中,以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大批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①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展示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面貌,西方近代考古学、民族学的传入以及在中国的初步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本节将对新思潮影响之下的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予以概括论述。

一、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传入及其影响

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中国史书汗牛充栋,成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传统历史著作撰述的基本形式。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由《史记》到《明史》多达3213卷、共计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成为中国历史学发达的重要标志,众多帝王将相的文学武功、丰富多彩的中华历史文化由此得以展现和传承。以中唐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代表的“典制体”著作的问世,以及此后出现的“续三通”和“清三通”,使中国封建时代的典章制度得到较为系统地记述。与西方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相比,中国传统史学虽然表现出自身的弱点,但中唐刘知几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出现,也使当代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成就不敢忽视,所有这些,显示出中国历史学具有深厚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以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春秋公羊学“变”的思想为武器,对埋头考据的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重倡经世致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面向世界和当代。徐继畲、梁廷枏、张穆、何秋涛等知识分子,推动了对边疆和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著作也逐渐引起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关注,王韬、黄遵宪等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正在急剧变革中的世界展现在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第180—18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知识分子面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史学观念传入中国,在梁启超等一批学者倡导和努力之下,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在科学化和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梁启超、李大钊、何炳松等著名学者为此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一) 以科学眼光审视中国传统史学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学走上科学化和近代化的道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欧洲和日本近代史学发展新趋向的影响,从挽救民族危机和建立中国新史学的目的出发,1902 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学类著作简略做了梳理,划分为 10 种 22 类,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四弊”和“二病”。所谓“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六弊”又产生了三项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①。今天看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不无偏激之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切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些弊端,由此催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自觉反思的学术思潮。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中国历史学自觉进行理论反思和总结的重要著述,对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六章,包括:史的意义及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的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五种专史概论;“分论”包括: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和断代的专史五个部分。梁启超明确提出历史研究法,阐述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史学家的素养,研究历史的方法及撰著历史著作的方法,这些奠定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内容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专门谈到了“史学史的做法”,明确提出创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之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做法,梁

^① 梁启超:《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之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他进而结合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的史学发展作了概括地论述。^①

梁启超创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史学史学科的发展。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听了梁启超的演讲之后，姚名达就萌发了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愿望，之后致力于史学史的研究，发表了《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年谱》等论著。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史学史课程逐渐走进了中国大学的讲堂，如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卫聚贤在上海持志学院、姚从吾在西南联大、白寿彝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并编写出了教学讲义；周谷城在复旦大学的讲义以《中国史学之进化》为题发表在1944年的《复旦学报》第1期上。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些著作受梁启超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第一、二章，即为古代之史官、古代之史家与史籍，最后一章为“最近史学之趋势”。白寿彝先生曾对金著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情况作过论述，他说：“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书在分期问题上，大致是接着梁启超所说的办法。梁启超对于分期说得不清楚，金的书在分期的概念上也不鲜明。梁启超主张史学史要写史官、史家、史学，金的书也就按照这三个部分去写。梁启超推重司马迁和班固，金氏书把司马迁和班固列为专章。梁启超在说史学发展的时候，举出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金的书没有把郑樵看得那么重，但还是把刘知几和章学诚列为专章。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作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②从白先生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巨大影响。

（二）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传入及其回响

20世纪20至30年代，在中国崛起的实证主义思潮极大地促进了实证史学理论以及中国历史学科学化历史进程。乾嘉考据学深深地影响了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初，甲骨文、敦煌经卷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相继发现，美国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5—3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第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德国兰克的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1911年移居日本后，王国维潜心致力于金文、甲骨文、汉晋简牍、汉魏石经、敦煌经卷的研究，在商周史和蒙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给学生开设了“古史新证”课程，他称自己的研究方法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的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古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②

留美博士胡适（1891—1962），接受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时，胡适主张以历史的眼光整理国故，以抵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金文还金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③ 关于“证据”的审核，胡适提出了五个方面：（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来的？（2）什么时候寻出来的？（3）什么人寻出来的？（4）从地点和时间看，这个人有作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在说这句话时有无作伪的可能？关于整理史实，胡适提出了四个步骤：（1）把每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以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4）如有可能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④。胡适1924年关于考证方法的上述论述，对于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极大地推动了实证史学的发展。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傅斯年（1896—1950），在1920年代早期曾留学英国、德

①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四）第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出版。

④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193—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